

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

齐杏发

摘要：中国中产阶级可分为以个体户为主的老中产阶级和由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以领取薪酬为主的新中产阶级两类，后者又包括以传统体制内职工为主的内源型中产阶级和以私企、外企白领为主的市场化中产阶级。利用 CGSS2006 全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产阶级明显反对非制度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其中内源型中产阶级更为保守，市场化中产阶级稍显激进，但这种差异尚不显著。中产阶级有总体上较强的民主意识，但市场化中产阶级更为重视经济发展，内源型中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意识偏强，老中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最弱。中产阶级都有较强的政府服从，并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愿，但老中产阶级相对冷漠。总的来看，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心理较为健康和理性，与中国渐进式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适应的。

关键词：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8-0003-09

作者简介：齐杏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政治学博士（上海 200241）

中资产阶级的出现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中国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关于中国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研究正日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兴趣。但由于在对中资产阶级的界定方式、调查和数据选取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和总体判断差异很大甚至相互对立。此外，研究者还往往较为笼统地讨论中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没有区分乃至混淆了民主意识、现实政治参与意识和对非制度化集体政治行动的态度等测量变量。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归为三种观点：保守的、激进的和多样化的。其中海外的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较为保守的偏多，国内研究则大多认为中产阶级较为激进。此外，新近的研究已开始审视不同类别的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及其显著差异，其分类方式既有新老中资产阶级的划分，也有体制内外的划分，其中体制内外的差异在近三年得到了显著重视。

1. 中国中产阶级较为保守。其具体分析方式大多是观察民主意识，是否可能开展非制度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和挑战政权系统等。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保守，他们比较反对非制

收稿日期：2009-12-16

^{*} 本研究受华东师范大学重大社科基金申报预研究支持项目“中产阶级政治动向研究”资助。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由作者自行负责。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度化的集体政治行动^①。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认为，中国的农业人口容易受到政治煽动或被购买，因此他们还不具备参加选举的条件，中国中产阶级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发展^②。经济利益是中国中产阶级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一阶层热衷于保护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并不会挑战政党系统^③。几乎所有类别的新中产阶级都严重依附于党和国家，在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状况下，中产阶级与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冲突^④。许多中国的中产阶级认识到，追求自主往往意味着被排斥到体制外，因而他们追求加入政治系统以取得较多的利益^⑤。

2. 中国中产阶级比较激进。其具体的分析方式大多是从中产阶级的政治满意程度、集体性政治行动等方面进行考察。有学者认为，总体上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并不保守，并且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具改造社会的风险^⑥。对北京业主维权运动中的中产阶级进行考察后发现，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有效地领导了集体行动，击溃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分利集团^⑦。中产阶级在物业纠纷的行动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⑧。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⑨，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是西方式民主的推动者^⑩。

3.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多样化的。这种类别的研究一般假定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多样化的并且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学者根据工作是否在公有部门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部分^⑪，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中产阶级进行分类分析。根据是否工作于国家部门可将中产阶级分为两大类，国有部门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更为保守^⑫，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明显偏低，而私营部门的中产阶级则有较强的民主意识^⑬。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谋求在现有政治制度下的变化，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必然会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机构产生显著的影响^⑭。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判断差异较大。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首先来自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不同。实际上，他们讨论的中产阶级的外延并不是相同的。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现有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地讨论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尚未深入细致分析与政治态度相关的几个重要测量变量。海外学者往往有一个暗含的研究假设，这就是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走向民主的，那么他们就必然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同时会支持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并且在现实中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基本上将三者等同，并经常从否定其中之一而推断出否定其它方面。然而，东亚中产阶级发展的实际特点已经表明，这三者并不能简单划一，20 世纪 70 年代的韩国中产阶级，就是既有民主意识，又不积极支持非制度化的政治行动；20 世纪 80 年代的台湾地区，中产阶级同样是既有民主意识，但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政权的对抗。那么，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真实状况到底如何呢？这就需要仔细区分中国中产阶级的类别，并从

- ① He Li, "Middle class: friends or foes to Beijing's New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 8 (2003), pp. 87 - 100.
- ② Jonathan Unger, "China's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Vol. 169, No. 3 (2006), pp. 27 - 31.
- ③ Yang Dali, "China's long march to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8, No. 3 (2007), p. 60.
- ④ David S. 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o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 post - 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1.
- ⑤ Bruce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
- ⑥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 ⑦ 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 ⑧ 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 ⑨ Ronald M. Glassman, *China in Transition: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91, p. 62.
- ⑩ Henry S. Rowen,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45 (1996), pp. 68 - 69.
- ⑪ Ping Huang,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Identity", *Chine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No. 2 (1993) 113 - 121.
- ⑫ 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6 期。
- ⑬ Lu Chunlong, "The Middle Clas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hinese Middle Class's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Towards Democracy", Ph. D. Dissertation,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2007.
- ⑭ He Li, "Middle class: friends or foes to Beijing's new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2003), pp. 87 - 100.

不同角度进行讨论。

二、数据、分析策略与操作化

对中产阶层进行界定非常困难，实际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对于中产阶层的所指也是不断变化的^①，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不同的界定^②。在具体标准上，最常见的指标有收入状况、教育状况、职业状况等。但实际上，这些标准也都是备受质疑的。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使用复合指标对中产阶层进行界定。李培林和张翼在界定中产阶层时同时选取了教育状况、职业状况、收入状况三项指标，符合其中三项者为核心中产阶层，符合两项者为半核心中产阶层，只符合一项者为边缘中产阶层^③。本文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指标借鉴了他们的做法，但不包括边缘中产阶层。

1. 数据来源和选取方式。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6）。该调查采取严格的分层抽样方式，在全国获取了10151份有效问卷。本文研究时首先按教育标准、收入标准、职业标准分别筛选了数据，再将这三组数据两两搭配，形成新的三组数据，最后将这三组数据汇总，剔除其中的重复个案，并除去了雇用8人以上的企业主和处级以上官员个案，因为他们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上层，最终得到1004个样本。其中的教育指标采纳了李培林等的研究标准，中专以上学历划入中产阶层，职业标准选取了问卷中回答工作中总是需要进行快速反应的思考和脑力劳动的个案，即李培林等的研究中所指的非体力劳动者，收入指标的划定标准为年收入2万元^④。各类别的个案数及最终入选个案数见表1。

表1 不同界定标准下的中产阶层个案数

| 指标 | 年收入 | 教育 | 职业 | 复合 |
|----------|-----------|------------|-----------|-------------|
| 样本数/回答总数 | 1125/9285 | 1900/10143 | 1527/6749 | 1004 /10151 |

2. 分析策略。以往研究显示，老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上可能存在差异，而中国的体制内外的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上也有明显差别。因此，本文首先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方法，将中产阶层分为以个体户为主的老中产阶层和由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以领取薪酬为主的新中产阶层两类，后者又包括以传统体制内职工为主的内源型中产阶层和以私企、外企白领为主的市场化中产阶层。在具体方法上，问卷中有1到7名雇员的老板、在自己家的企业中工作的、为自己经营、买卖或企业工作的等，都划入老中产阶层；工作单位为党政机关、国有或国有控股及集体或集体控股的企事业单位，划入内源型中产阶层；除了3份无法归类的之外，其他均划为市场化中产阶层。最终三大类别的人员结构比例如下：

表2 不同类别的中产阶层个案数

| 类别 | 老中产阶层 | 内源型中产阶层 | 市场化中产阶层 | 无法归类的 | 总计 |
|-----|-------|---------|---------|-------|------|
| 样本数 | 104 | 598 | 299 | 3 | 1004 |

① David S. G. Goodman and Xiaowei Zang, "The new rich in China: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change", David S. G. Goodman (eds.),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Routledge, 2008, p. 6

② L. F. Macintyre,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class in health studies: old measures and new formulations", in M. Kogevinas et al. (eds.),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Cancer*, (Lyon: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No. 138, 1997, pp. 51-64.

③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载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层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06页。

④ 李培林等采纳的标准为家庭人均年收入1.4万元以上，本研究中由于无法从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中推算出家庭人均年收入，因此大致采纳了个人年收入2万元这一标准。这一标准实际上也与国际上大多数学者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的界定接近。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Alastair Lain Johnston, "Chinese Middle Class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scent Libera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9 (2004), pp. 607-609.

本研究分别从对非制度化集体行动的支持程度、民主意识、现实政治参与意识三个方面观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这样划分的理论依据是，这三个方面对于综合判定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至关重要，同时，这三个方面并不能等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这三个方面的态度上可能是多样化的，而这可能恰恰是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特色所在。

3. 操作化。一共选取 10 个问题。其中对非制度化集体政治行动方面的问题是“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下面包含 3 个具体问题，分别是对公开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赞成程度，另选一个制度化集体政治行动问题作为参照，问题是对上访的态度。以上问题的答案均为非常赞成、比较赞成、比较不赞成、非常不赞成，得分分别为 1、2、3、4 分。关于民主意识方面的问题有 3 个，分别为“我了解我们村/社区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有权参与村/社区的事务”，“如果有机会参加县长/区长的直接选举，我一定会积极参加投票”，“只要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就不必提高民主程度”，以上问题答案均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得分分别为 1、2、3、4 分。反映现实政治参与意识的问题也有 3 个，分别是“服从政府总是不会错的”，“政治的事情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不懂”，“经济条件好的人比经济条件差的人在公共事务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以上问题答案均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得分方式与民主意识方面一样。

三、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分类方式和选取的问题，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均值并进行统计学检验，得出的结果如下：

1. 对集体政治行动的态度。首先是比较三类中产阶级在对待非制度化集体政治行动方面的得分均值。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非制度化的集体政治行动总体上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对公开集会、游行示威、罢工方面的得分均明显超过均值（2.5 分），只是对上访这一比较温和的并且仍然属于制度化的这一行动方式，中产阶级并不反对。这说明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追求政治稳定，反对政治动荡的，对非制度化的集体政治行动较为厌恶，激进的集体政治行动在中产阶级中没有民意基础。

表 3 中产阶级对集体政治行动的态度

| 类别 | 结果 | 问 题 | | | |
|---------|-----|---|--|---|---|
| | | E19-1.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公开集会 | E19-2.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游行、示威 | E19-3.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罢工 | E19-4.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上访 |
| 老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64 | 2.97 | 3.03 | 2.20 |
| | 样本数 | 98 | 98 | 97 | 100 |
| | 标准差 | 0.828 | 0.843 | 0.835 | 0.995 |
| 内源型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77 | 3.01 | 3.03 | 2.21 |
| | 样本数 | 537 | 541 | 536 | 550 |
| | 标准差 | 0.842 | 0.828 | 0.798 | 0.889 |
| 市场化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63 | 2.88 | 2.92 | 2.16 |
| | 样本数 | 279 | 288 | 284 | 289 |
| | 标准差 | 0.919 | 0.853 | 0.878 | 0.918 |
| 总计 | 平均数 | 2.72 | 2.97 | 3.00 | 2.19 |
| | 样本数 | 914 | 927 | 917 | 939 |
| | 标准差 | 0.867 | 0.838 | 0.828 | 0.909 |

内源型中产阶级反对非制度化集体政治行动最容易理解。如果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是来源于国家权力系统，他们就会支持国家领导人，并且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①。内源型的中产阶级大多被支付了高于平均价格的工资，并且许多人期待在体制内的发展^②，因而对政治行动会更为反对。市场化的中产阶级也对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持反对态度，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这一阶层认同中国政治制度对他们的发展仍然是有利的，这与台湾地区当年的情况较为类似^③。老中产阶级也反对非制度化集体政治行动，这可能与他们的既得财产有关。这一阶层可能担心政治混乱和来自下层的政治威胁，所以希望国家维持强势^④。

从类别来看，内源型中产阶级在前三个问题中各项得分最高，市场化中产阶级在这三个问题中得分均为最低，这意味着前者更为追求政治稳定，相对而言后者这种意愿稍弱一些。但在统计学检验中，我们发现这三个类别对四个问题的回答，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说明三大类别间虽有差别，但尚未发展到明显差异的程度。见表 6。

2. 民主意识。西方学者的大多数研究，往往非常注重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否与国家和制度产生直接对抗，并以此来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民主意识，但如前文所述，东亚的中产阶级可能表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即可能对政治稳定的追求和民主意识的发展同时出现。从前面分析可知，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追求稳定的，那么他们是否存在了一定的民主意识呢？这可以从权利意识、投票意识和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替代民主的态度中反映出来。表 4 为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结果。

表 4 中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情况表

| 类别 | 结果 | 问 题 | | |
|---------|-----|---|---|--|
| | | E47 - 29. 同意程度 - 我了解我们村/社区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有权利参与村/社区的事务 | E47 - 30. 同意程度 - 如果有机会参加县长/区长的直接选举，我一定会积极参加投票 | E47 - 32. 同意程度 - 只要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就不必提高民主程度 |
| 老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75 | 2.96 | 2.11 |
| | 样本数 | 93 | 92 | 97 |
| | 标准差 | 0.732 | 0.591 | 0.748 |
| 内源型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84 | 2.97 | 2.22 |
| | 样本数 | 564 | 551 | 564 |
| | 标准差 | 0.648 | 0.672 | 0.788 |
| 市场化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83 | 2.88 | 2.29 |
| | 样本数 | 276 | 270 | 289 |
| | 标准差 | 0.647 | 0.682 | 0.853 |
| 总计 | 平均数 | 2.83 | 2.94 | 2.23 |
| | 样本数 | 933 | 913 | 950 |
| | 标准差 | 0.656 | 0.668 | 0.805 |

① Luigi Tomba,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Vol. 51 (2004), p. 24.
 ② He Li,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and Its Implications",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3, No. 2 (2006), p. 71.
 ③ Hsin - Huang Hsiao, "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y 1990), pp. 163 - 80.
 ④ An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2002), p. 421.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意识。三大类别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一致性特征，即都认为了解自己了解村或社区的事务因而有权参与，如果有机会参加县长或区长直接选举，他们一定会积极参加投票。当问到是否同意经济稳定发展就不必提高民主程度时，获得的得分低于均值（2.5 分），说明他们总体上不认同经济发展可以取代政治民主。三大类别在得分上未表现出很大差异，说明他们在对待民主的问题上立场较为一致，对发展民主持积极态度并随时准备参与到民主进程当中。在统计学检验上，也未发现三大阶层中有明显差异，见表 6。

我们的这一发现与安戈·乔纳森等大多数海外学者的研究和判断明显相左^①。这也正是东亚的中产阶级政治发展中的独特之处。实际上，对中产阶级民主意识的分析，是理解中产阶级在网络政治参与、社区政治参与和各种社团政治参与等方面开展积极行动的关键所在，而这种政治参与每天都在进行。如果忽略了中产阶级的这一特征，一方面将无法理解中产阶级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也将对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的预测产生偏差。

3. 现实政治参与意识。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方面追求政治稳定，同时又有较强的民主意识，那么当前他们对参与现实的政治态度是怎样呢？由于受问卷设计的制约，本研究中从个案对政府的服从、对政治的事情的认识和对谁在公共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的判断中进行间接考察，这样选取的依据是，对这几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个案的政治参与态度。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中产阶级的现实政治参与意识情况表

| 类别 | 结果 | 问 题 | | |
|---------|-----|-----------------------------|------------------------------------|---|
| | | E47 - 11. 同意程度 - 服从政府总是不会错的 | E47 - 31. 同意程度 - 政治的事情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不懂 | E47 - 33. 同意程度 - 经济条件好的人比经济条件差的人在公共事务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
| 老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71 | 2.57 | 2.60 |
| | 样本数 | 98 | 97 | 100 |
| | 标准差 | 0.873 | 0.735 | 0.829 |
| 内源型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67 | 2.38 | 2.31 |
| | 样本数 | 568 | 553 | 578 |
| | 标准差 | 0.789 | 0.771 | 0.806 |
| 市场化中产阶级 | 平均数 | 2.56 | 2.49 | 2.33 |
| | 样本数 | 280 | 273 | 290 |
| | 标准差 | 0.783 | 0.809 | 0.812 |
| 总计 | 平均数 | 2.64 | 2.43 | 2.35 |
| | 样本数 | 946 | 923 | 968 |
| | 标准差 | 0.797 | 0.781 | 0.814 |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有较高的政治服从，回答“服从政府总是不会错的”的得分高于均值。对现在政治的态度上，中产阶级总体上并不同意“政治的事情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不懂”，并且也不认为经济条件好的人在公共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后两个问题上，还可以发现三类中产阶级的差异，其中老中产阶级的得分明显偏高，全部高于均值，另两类中产阶级的得分明显偏低，其中内源型中产阶级的得分最低，说明老中产阶级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而

① Jonathan Unger, "China's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Vol. 169, No. 3 (2006), pp. 27 - 31.

内源型中产阶级对政治的态度最为积极。在统计学检验后发现，后两个问题的回答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6：

表 6 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差异的统计学检验

| 问题 | | 平方和 | 自由度 | 均方 | F | P |
|--|----|---------|-----|-------|-------|-------|
| E19 - 1.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公开集会 | 组间 | 4.281 | 2 | 2.141 | 2.861 | 0.058 |
| | 组内 | 681.758 | 911 | 0.748 | | |
| | 总计 | 686.039 | 913 | | | |
| E19 - 2.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游行、示威 | 组间 | 3.493 | 2 | 1.746 | 2.492 | 0.083 |
| | 组内 | 647.536 | 924 | 0.701 | | |
| | 总计 | 651.029 | 926 | | | |
| E19 - 3.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罢工 | 组间 | 2.643 | 2 | 1.321 | 1.931 | 0.146 |
| | 组内 | 625.340 | 914 | 0.684 | | |
| | 总计 | 627.983 | 916 | | | |
| E19 - 4. 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述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 - 上访 | 组间 | 0.416 | 2 | 0.208 | 0.251 | 0.778 |
| | 组内 | 774.462 | 936 | 0.827 | | |
| | 总计 | 774.878 | 938 | | | |
| E47 - 29. 我了解我们村/社区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有权参与村/社区的事务 | 组间 | 0.666 | 2 | 0.333 | 0.773 | 0.462 |
| | 组内 | 400.578 | 930 | 0.431 | | |
| | 总计 | 401.243 | 932 | | | |
| E47 - 30. 如果有机会参加县长/区长的直接选举，我一定会积极参加投票 | 组间 | 1.654 | 2 | 0.827 | 1.856 | 0.157 |
| | 组内 | 405.384 | 910 | 0.445 | | |
| | 总计 | 407.038 | 912 | | | |
| E47 - 32. 只要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就不必提高民主程度 | 组间 | 2.419 | 2 | 1.210 | 1.870 | 0.155 |
| | 组内 | 612.633 | 947 | 0.647 | | |
| | 总计 | 615.053 | 949 | | | |
| E47 - 11. 服从政府总是不会错的 | 组间 | 3.118 | 2 | 1.559 | 2.459 | 0.086 |
| | 组内 | 597.830 | 943 | 0.634 | | |
| | 总计 | 600.948 | 945 | | | |
| E47 - 31. 政治的事情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不懂 | 组间 | 4.436 | 2 | 2.218 | 3.658 | 0.026 |
| | 组内 | 557.806 | 920 | 0.606 | | |
| | 总计 | 562.243 | 922 | | | |
| E47 - 33. 经济条件好的人比经济条件差的人在公共事务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 组间 | 7.403 | 2 | 3.702 | 5.640 | 0.004 |
| | 组内 | 633.353 | 965 | 0.656 | | |
| | 总计 | 640.756 | 967 | | | |

从表 6 中可知，三类中产阶级在政府服从方面未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但在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差异明显。本研究对三类中产阶级现实政治态度的差异的解释是，内源型中产阶级更为接触政治，因而对政治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而老中产阶级离政治最远，对政治参与的认知不多。一般认为，对政治事务熟悉的群体，会有更高的参与意识，所以导致了内源型的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间的显著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总体判断是，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心理是较为积极和健康的，是和谐社会建

设的稳定和有益的力量。中产阶级一致反对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主张在现有政治架构内解决问题。同时,他们又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正如英格哈特和韦尔策尔等很多学者研究所发现的,一个倾向于民主的大众政治文化对民主的发展和维持是非常有益的^①,中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存在着潜在可能。在对待现实政治参与问题上,中产阶级的政治服从程度较高,除了老中产阶级之外,内源型中产阶级和市场化中产阶级都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总体上看,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特征基本存在,见表7。

表7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概览

| 类别 | 对政治稳定的支持态度 | 对民主的支持程度 | 对政治参与的支持程度 |
|---------|------------|----------|------------|
| 老中产阶级 | 高 | 高 | 低 |
| 内源型中产阶级 | 高 | 高 | 高 |
| 市场化中产阶级 | 高 | 高 | 高 |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中有几个重要发现:

第一,中国中产阶级有着较强的民主意识,这点尤其是与多数海外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判断明显相左。

第二,内源型中产阶级与市场化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无显著差异,说明体制的区分尚未对中产阶级内部产生重要影响。这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选取有关,因为本样本中不包括失业大学生和体制外低收入知识分子等群体,而这一群体往往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②。此外,我们也看到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着比较小的但有明显规律的特征,其今后如何变化值得跟踪关注。

第三,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追求政治稳定上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这点尤其与国内关于中产阶级较为激进的判断不符。

第四,老中产阶级对现实的政治参与兴趣不大,但新中产阶级对现实政治参与较为支持。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认清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情况非常有意义。总体来看,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较为乐观,所以发展和壮大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不会带来直接冲击。但同时需要关注的是,三大类别的中产阶级一致反对“经济发展可以替代政治民主”,显示出党执政的绩效型合法性面临一定的挑战,健全民主制度、建立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将是我党和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态度,有可能造就中国中产阶级影响政治的独特方式。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网络政治参与。这种参与方式是和中产阶级的特点高度吻合的。因为网络政治参与一方面有强大的力量,充分展露中产阶级民主的一面;同时又有制度化的一面,尚不会对政治系统构成冲击,因而也在制度许可范围内,甚至受到政府的支持。网络政治参与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最为典型,傅德志等内源型中产阶级的推动是事件发展的直接力量。

二是社区参与。这种参与方式同样符合中产阶级的特点。由于单位制的解体,中产阶级过去那种依靠单位提供就业、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的状况^③,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为他们不受干预地开展有限行动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当他们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较大,而这可能进一步推动民主意识的加强。由于社区参与不会对政治系统构成

①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Minxin Pei, "Wi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March 12, 2009.

③ Xiaowei Zang, "Market transition, wealth, and status claims", David S. G. Goodman (eds.),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Routledge, 2008, p. 69.

威胁，因此社区参与也在制度许可范围内。摩尔曾认为，中产阶级对自我财产的保护促使了自由和民主的发展，并且提出了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①。

三是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参与各类注册或未注册的社会组织。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产阶级参与人数的日益增多，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在中产阶级的发展史上，这一阶层最初发展时往往都是支持政权稳定的，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受损^②。但在他们逐步发展壮大时，其可能的政治影响，无疑值得高度关注。

(责任编辑：李 申)

评审意见：论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 2006 年的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论文的新意是根据我国中产阶级来源和成分的多样性，把中产阶级进一步细分为老中产阶级、内源型中产阶级和市场化中产阶级，并比较他们政治态度的差异。

我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热点，已有的研究也有中产阶级是保守的稳定器还是激进的变革器的争论。这项研究对于推进这方面的分析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作者提出在政治态度方面应当区分民主意识、现实政治参与意识和对非制度化集体政治行动的态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同意发表此文，但希望能做一些修改。如三种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差异不明显，也使得划分意义减弱，可以跑跑数据，试试其他的态度，看看他们究竟在什么方面有差异；或者加一部分数据分析，说明他们的态度差异在非政治方面。

评审专家：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p. 418.

② Er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2000), pp. 175 - 205.